

DANCING SOLO

Women Left Behind in Rural China

中国农村留守人口之留守妇女

阡陌独舞

叶敬忠 吴惠芳 著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外出到城市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现象随之出现。丈夫外出务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改善了家庭生活。然而，因为丈夫在家庭中的缺席，留守妇女独自承担起农业生产、子女抚育、老人赡养等家庭责任，因而面临劳动负担和心理负担同时加重的困境。此外，夫妻长期的空间分离不仅使婚姻的许多功能无法得以实现，也使他们的婚姻稳定面临诸多挑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叶敬忠 吴惠芳 著

阡陌独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留守人口之留守妇女: 阡陌独舞/叶敬忠, 吴惠芳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097 - 5797 - 0

I. ①中… II. ①叶… ②吴… III. ①农村 - 妇女 - 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5447 号

中国农村留守人口之留守妇女: 阡陌独舞

著 者 / 叶敬忠 吴惠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韩莹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本卷印张: 26.75 本卷字数: 473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797 - 0

定 价 / 248.00 元 (全三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其中大量的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外出到城市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现象随之开始出现。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影响的研究,后来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的各种权利、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问题。仅在最近两年,留守妇女问题才引起一些关注,这比留守妇女现象出现的时间滞后了近 20 年。

我们对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始于 2004~2005 年开展的“关注留守儿童”的研究。在该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留守儿童属于单亲监护类型,即父亲外出务工、母亲留守在家照顾儿童的情况。在探讨留守儿童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他们的母亲——留守妇女所承受的繁重的劳动负担和沉重的心理负担,这引起了我们对留守妇女的关注。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关注媒体和学术界关于留守妇女的讨论和研究。自 2006 年 11 月,我们组成“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课题组,并开始对农村留守妇女展开全面的研究。

本研究在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 5 个省份,即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各选择了 1 个县,每个县选取 2 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 1 个行政村,共计 10 个行政村作为研究社区。实地调研采用了问卷、个案深度访谈、半结构访谈、小组访谈法,完成了每个调查地点的社区概况、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的问卷与案例、留守妇女不同相关群体的小组访谈以及县、村干部访谈等,获得了丰富的一手数据和资料。另外,研究还设计了对在北京市的务工人员的调查,以考察外出务工丈夫视角的留守妇女问题。

本书所呈现的是本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介绍,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过程以及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的现状以及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影响,从人口学特征、其他基本特征、家庭经济、农业生产、家庭关系与社会网络、心理感受、闲暇娱乐与自我发展几个方面全面展示了留守妇女的生活;第三部分是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与社会支持,分别从留守妇女自



身能动地应对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以及外部对留守妇女的支持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是留守妇女的多元性分析，从年龄、丈夫务工情况、分家及居住状况三个维度论述了留守妇女群体内部的异质性；第五部分从不同角色的视角对留守妇女问题进行了审视，包括外出务工丈夫、留守老人及其他角色；第六部分是专题讨论，对实地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与留守妇女相关的议题进行了思考和分析。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课题组成员历时一年半的集体研究成果。在前期研究设计阶段，课题组成员连续两个月讨论和修改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等设计方案。实地调查中我们始终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与农民朋友的同吃同住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观察、体验和感悟留守妇女的生活现实。在承担着巨大的调查研究任务的同时，课题组成员经历了农村生活的考验与磨炼。试调查期间，课题组有的成员不适应当地饮食而闹起了胃病，有的被蚊虫叮咬得满身是包、瘙痒难耐；正式调查期间，调查地区都处于炎热的农忙季节，留守妇女白天都在田间忙碌，课题组成员或中午顶着暴晒的烈日或起早贪黑到家中找人，很多时候则是蹲在田间地头或与她们共同劳动中完成调研。实地调研结束后，课题组立即开始了问卷整理核对、录入、数据输出、讨论研究发现、数据分析、报告撰写及讨论与修改工作。在此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有争论、有冲突，但最终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更加清晰、更加深入，并达成了共识。正是课题组所有成员夜以继日的辛劳，才使得我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及时出版，在此对课题组所有成员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们希望本书可以全面、深入地展示留守妇女的生活世界，并借此引起社会各界对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和关心。本研究在揭示农村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影响的同时，也对相关的社会政策与可能的干预行动提出了建议。希望本书可以为从事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农村发展与妇女研究的机构和个人提供第一手资料和学术参考，为农村妇女工作者尤其是各级妇联组织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妇女工作实践者提供一定的借鉴，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制定应对留守妇女问题政策的依据。本研究肯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将继续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由叶敬忠教授主持，参加人员包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是吴惠芳、王伊欢、张克云、杨照、饶静、黄颖、刘娟、辛允星、刘鹏、张亚鹏、潘璐、贺聪志、李春艳、那鲲鹏、安苗、赵勇、赵康、王奕、范旻、孟祥丹、陈世栋、田坤、呼占平、梁振华、刘剑鹏、李伟军。



本研究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6-0118)、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以及德国EED基金会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在调查过程中大力支持和配合我们的省、县、乡、村各级的干部,尤其是不分白天黑夜、雨天晴天,带领我们走乡串户访问农民的村干部们,也深深感谢尽己所能为我们提供饮食住宿条件的所有农户!

我们真诚感谢接受我们调查的留守妇女、非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外出务工人员、地方干部和村民!尤其要特别感谢与我们真诚面对的留守妇女!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无数次面对留守妇女谈到其留守生活时无法抑制的眼泪,我们的交流是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却因此触动了她们生活的痛处,为此我们感到深深的内疚。她们在巨大的劳动负担和心理压力下,为了家庭的生计独自忙碌且能积极应对多种困难与挑战,在此,我们也向她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独自在农村承担起家庭的各种责任,因而背负着劳动的艰辛、心理的沉重和生活的无奈,但她能以积极的能动性采取各种策略和行动,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坚强地支撑着留守的家庭。本书正是希望以《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这一书名来描绘和概括留守妇女的这种生活特征和生活精神。

叶敬忠

2008年5月于北京

再版前言

自 21 世纪初，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团队持续关注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并坚持开展学术研究，积极参与社会讨论。自 2005 年出版国内第一部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专著《关注留守儿童》之后，目前已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中英文文章近百篇。在这些研究成果中，2008 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系列成果《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获得了较好的学术评价和社会反响，并先后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四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其中《阡陌独舞》还入选第五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这次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之邀，对这三部研究专著进行再版。我以为，再版既非简单的加印，也非对原有研究彻底的更新。前者最为容易，无须作者和编辑下任何功夫，开动机器便可完成，但是对原著作的明显缺陷不加任何订正则很难为情；后者最为繁难，但是，若将近年来的思想进展与研究视角全部融入其中，则实为新著，且无法保持特定时期的作品所呈现的时代风格与外貌。然而，在此二者之间取一折中，又岂是易事？思量再三，我们决定，基本保持原著作的特色，但是删除一些略显冗余的章节——主要涉及留守人口的多元性和不同角色视角分析部分，并对其余部分进行适当修订。这样，这三部专著仍可展现 21 世纪前十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人口留守的现实及学术研究思考，能够反映改革开放 30 年，在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与之相生相伴的农村留守人口社会问题。如此看来，再版此系列著作，确有其价值。

以上溢美之词，似有浮夸之意。在我看来，任何研究，若不能认清自己的局限，并不断反思、批判和否定自己，则绝无可能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这三部研究专著，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这三部研究成果，是 27 位研究人员经过两年的准备、实地调研、资料整理与分析、成果撰写等紧张过程而完成的，是对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现实世界的直观呈现。从对农村留守人口“386199”的形象比喻以及“别样童年”“阡陌



独舞”和“静寞夕阳”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该研究的主调还是对农村留守人口的悲情叙事，是对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对农村留守人口所产生影响的一种朴素描述。这一研究成果的确触动了社会，打动了受众，让留守人口群体赢得了同情和关注。作为亲历研究过程的一员，我也心情沉重，因为与城市物欲横流的生活相比，留守人口在农村的生活是如此艰辛和困苦。在我们展示研究成果时，很多受众无比感动，几至潸然泪下。第一次将农村三大留守群体全面展示给社会，或许是三部著作的时代贡献，但同时也是其主要局限。这是因为，过度聚焦于对留守人口的生活及其所受影响进行展示和分析，难以脱离表象层次，研究和解释的深度显得不够。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对农村留守人口问题的思考，需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需要如福柯所言，“后退几步，绕过那熟悉的事实，分析置身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从“是什么”（如此三部著作所呈现的，留守人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受到什么影响）推进到“为什么”（即为什么留守人口会承受那样的生活，为什么会受到那些影响）层次，这也是当前我们对这一主题进行探索与思考的重点。

对农村留守人口现象之“为什么”的探讨，我们尝试了反思发展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发展”为主旋律，并通过话语体制，将之变成政府的目标、国人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时至今日，“发展”已经变成真正的“硬道理”，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狂热、为之献身。只要一踏入今日之乡村，我们就会深刻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乡村躁动和乡村人口创业赚钱的狂热。这样的“发展”已经演变成“发展主义”。根据许宝强的定义，发展主义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它坚信应该通过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手段实现快速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这意味着，需要改造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村和农业，为此，农民、农村和农业必将承受转型的阵痛和代价。而劳动力流动和农村留守人口现象，集中体现了农民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承受的社会代价。今日之乡村，那些以互惠为文化根基的乡村共同体、以农业为生活方式的农民、以退却方案为保障的乡村生产安排，在“发展主义”的洗礼中，越来越失去存在和合法性的空间。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不断地市场化和商品化，农村人口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无论是农村的男性，还是女性，均逃脱不了这一巨大压力。“在农村没有出路”是农村年轻人对问题的最准确表述，



是生活和社会高度商品化之后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农民多元的生计方式遭遇现代化和商品化时，留给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多了，除了外出务工挣钱，以协助全球商品运转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因此，农民必须外出挣钱、养家糊口。但是，为了农村家庭的照料和生产需要，有人需要外出流动，有人则需要留守，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研究的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

因此，从反思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商品化进程切入，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可以进入新的高度。在此方面，研究需要直面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四大问题，即在流动与留守过程中，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了什么？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国家发展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农村留守人口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也包括此代价在乡城、代际和性别之间的分配和转移。例如，很多留守农村的儿童和老人，一方面面临严重的照料赤字，另一方面，其照料人又进城为城市人口提供照料服务，从而换取现金收入，这就是普遍存在的照料的乡城转移。再如，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性别分工规范、父权制和从夫居的文化实践，以及家庭中心主义，使得在流动与留守的决策和安排中，女性还承受着除强制商品化之外的性别排斥，这进一步加重了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类似这样的一些研究进路，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和思考。

对农村留守人口现象之“为什么”的研究，还需要生命政治的视角。人口流动与留守的决策和安排，离不开国家在宏观层面对生命和生命体的管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如此。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主导的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家通过人口管理政策，将农村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配置给城市。很多学者把农村劳动力往城市流动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是，严海蓉等的研究指出，这些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大多是农村人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新型农业生产发展最需要的人。也就是说，每年外出务工的上亿农村劳动力并不是剩余劳动力，留守在家里的或许才可称得上剩余劳动力。对于那些进城的农民工来说，劳动是他们生存的唯一方式，一旦因恶劣的工作条件而患上慢性疾病，或因遭受伤残而丧失劳动能力，返回农村老家就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因此，农村这个“大水库”不停地放出新鲜的劳动力，同时吸收伤残病余人口。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崇尚资本和市场的万能作用思维下，政府对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既缺乏具体的社会保护政策，更缺乏制定特殊保护政策的意愿；塔妮娅·李（Tania Li）认为，这是一种“使其生、任其死”的策略。的



确，在现代化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劳动被严重削弱，无数身强体壮的劳动力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已经不再是马尔萨斯意义上的“剩余人口”，而沦为鲍曼意义上的“废弃的生命”。

除了上述研究与思考的转变之外，农村留守人口面对的现实在近几年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开始阶段，外出者大多为家计所迫，赚钱是唯一目的，且大多为男性外出；如今，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村青年的成年礼和通过仪式，打工已经成为农村社区的主流文化，“城乡两栖”的打工生活已经成为农村青壮年的主流生活方式，大量女性外出务工，在很多村庄几乎找不到年轻人，尤其是离开学校的年轻未婚女性。凡留守乡村者，每家都有一个特殊的未外出原因，但是，无论谁留守乡村，也无论留守者与外出者有无家庭关系，他们都无法逃离与村庄整体劳动力外流的联系，或直接，或间接；也无法避免劳动力外出对他们的影响，或正面，或负面。因此，中国的乡村就是一个一个的留守社区。这些乡村剧变，既为研究者提供了经验研究的机会，也对社会现实的学术解释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农村留守人口本身之变动性，要求研究者持续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坚持去乡村变局中学习、思考和研究。

针对农村留守人口问题，我们常常被问及“怎么办”。我以为，对于社会问题，其根源是人的问题，确切地说，是社会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问题。只要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其涉及的利益和权力关系，那么要应对或解决社会问题，无非是要重新配置资源、调整利益和权力关系。这是政府决策部门最为擅长的行动，且不同部门的行动差异会很大。因此，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分析社会问题的根源，而“献策”往往缺乏针对性，缺乏实施主体，也每每停留在美好愿望的层面。当然，这一认识取向或被曲解为对社会问题的“无解”。其实，对于社会问题，只要思想上解决了认识问题，应对或解决起来真有那么困难吗？相反，若没有解决认识问题，即使得到研究者的“献策”，又会采纳或实施吗？

留守人口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体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因此，留守群体现象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一个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简单来说，这种发展模式要改变对农村和农民生存资源的挤压与攫取，还原和重建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停止以“现代化”和“效率”为名对农村土地、人力、资金、教育等各种资源进行汲取，杜绝以政策手段加剧农村社会的凋敝；同



时，将财政投入和扶持政策真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以地方特色和农民意愿为前提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实现本土生活的安定富足。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式，制度干预需要跳出对市场和资本的依赖，更多侧重于对人的关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农村发展现实是：农村社区越来越失去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在城市偏向、物质增长和商品观念的主导下，农村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物质化与商品化，这对于家庭和社区支持网的建立、社区信任与活力的重建都是巨大的挑战。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民被迫征地上楼、教育进城、现代农业和资本下乡……目前的发展政策仍然在以“现代化”的模式加速对农村共同体的瓦解。在这样的村庄，很多村民感到的是空荡、落寞和凋敝，远不是农村留守人口能够守望相助、获得支持的宜居家园。

面对沉重的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在我们的发展政策、思维意识和日常生活中，也许应该思考的最根本问题是，农村居民真正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国家的发展又该还以他们一个怎样的乡村？我们能否在乡村之中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和农村生活留出更多的空间？

叶敬忠

2014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导 言	001
-----------	-----

第一部分 研究介绍

1. 研究设计	017
2. 文献综述	041

第二部分 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的 现状与所受影响

3. 留守妇女的人口学特征	057
4. 留守妇女家庭的经济、生产与决策	072
5. 留守妇女的夫妻关系	098
6. 留守妇女的家庭关系与社会网络	117
7. 留守妇女的心理感受	139
8. 留守妇女的闲暇娱乐与自我发展	161

第三部分 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与社会支持

9. 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	173
10. 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	208

第四部分 留守妇女群体的多元性

11. 不同年龄段留守妇女的差异	221
------------------------	-----



12. 丈夫不同务工情况留守妇女的差异	232
13. 不同分家及居住状况留守妇女的差异	245

第五部分 不同角色视角的留守妇女

14. 外出务工丈夫视角的留守妇女	255
15. 留守老人视角的留守妇女	274
16. 其他角色视角的留守妇女	282

第六部分 专题讨论

17. 全球化技术与留守妇女	293
18. 礼物：在留守妇女和丈夫之间	302
19. 留守妇女与宗教信仰	309
20. 留守妇女与新农村建设	317
21. 哺乳期留守妇女	325
22. 跨地区婚姻中的留守妇女	332
23. “破烂王”的留守妻子	338
24. 留守妇女的互助与合作	345
25. 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围城心理”	355
26. 农村三大留守群体相依为命	363

附录	372
----------	-----

参考文献	408
------------	-----

导 言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农村独特的“留守人口群体”——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开始出现。在这三个留守人口群体中,留守妇女负担最重、对农村发展影响最大,但受到的关注却最少。目前已有的一些关于留守妇女的研究普遍认为,丈夫外出务工给留守妇女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尚缺少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自2006年11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开展了“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以更深入地了解留守妇女的生活,从多维度和多视角来揭示留守妇女的现状、能动性、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留守妇女问题的建议。导言部分是对本研究主要内容和成果的摘要。

一 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的现状与所受影响

(一) 留守妇女的人口学特征

在被调查留守妇女中,年龄分布于36~45岁的超过半数,年龄为26~35岁的比例为29.0%,婚龄分布集中于6~25年。留守妇女接受小学教育的最多,其次是初中,文盲占总数的23.0%。但是,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段留守妇女的文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生育率方面,留守妇女生育2个孩子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生育1个孩子,不同地区留守妇女的生育率有所不同。哺乳期留守妇女是留守妇女中一个特殊的亚群体。大部分留守妇女养育着1个或2个留守儿童。

丈夫外出、妻子留守,是家庭的理性决策结果。丈夫外出务工的原因复杂多样,经济原因主要是为了家庭生计,包括解决家庭入不敷出的局面、修房建屋、子女教育或结婚、还债或还贷款等;社会原因包括农村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社区务工潮流及其他原因(如出去见世面)等。妇女留守的原因主要包括孩子学习辅导和生活照料需要、农业生产需要、照顾老人需要、自身能力限制无法外出等。



被调查留守妇女的丈夫与同乡结伴外出的比例最高，每年外出务工的时间以9~12个月为主，务工地点以外省（市）为主，务工行业主要有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和服务业等。近半数留守妇女的丈夫每年只回家一次。半数以上留守妇女的丈夫在外务工时间超过10年。

近1/3的留守妇女身体状况较差，常年劳累、缺乏营养造成的疾病和妇科疾病是她们的常见疾病。她们仍以农业生产为主，近半数留守妇女曾经外出务工。与公婆分家的留守妇女比例大大高于未分家的比例，结婚未滿5年、有独生子女家庭的留守妇女大多未与公婆分家。分家与否是影响留守妇女与公婆共同居住的重要因素，总的看来，留守妇女与子女同住的情况最多。

（二）留守妇女家庭的经济、生产与决策

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家庭的经济贡献较大，主要体现在提高家庭日常生活水平、解决子女教育费用问题、解决医疗费用问题、改善家庭居住环境等方面。留守妇女家庭的三项主要支出是孩子上学花费、日常生活开支、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投入。子女教育仍是留守妇女家庭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目的。留守妇女对丈夫务工收入的态度形成“不满意+没办法=满意”的模式。近九成留守妇女认为丈夫在外花销正常或比较节俭。尽管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掌管家庭财务的比例大大提高，但她们仍是家庭财务的被动掌管者，她们对家庭财务管理概念更多的诠释是“看管”而非决策。电视机、手机和固定电话是留守妇女家庭生活耐用品拥有率最高的“三大件”。在丈夫务工期间，留守妇女家庭增加最多的生活耐用品是手机和固定电话。

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成为家庭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劳动力不足、没有掌握技术、生产资料购买困难等是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留守妇女通过两种方式应对这些问题：一种是减少耕种土地的面积；另一种是调整农业生产的类别。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分工由于丈夫外出务工而发生了较大的调整，由丈夫主要承担转变为留守妇女主要承担，这充分说明了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女性化趋势；对于家务劳动，留守妇女仍是主要承担者，但丈夫的辅助作用降低甚至完全没有。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家庭劳动，留守妇女承担的比例都在85.0%以上，占了绝大多数，这充分说明了留守妇女沉重的劳动负担状况。劳动分工的变化还充分说明，因为丈夫外出务工，农村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劳动分工模式被打破。



丈夫外出务工增加了留守妇女代表家庭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使她们在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参与程度得到提高。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决策变得比丈夫更重要。丈夫虽然不在家,但在家庭重大事项的决策上仍然处于核心地位。从总体看,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地位得到了提高,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留守妇女的负担和压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留守妇女在家庭管理中的地位,增强了她们的家庭管理和经营能力。

(三) 留守妇女的夫妻关系

丈夫在外务工期间,留守妇女和丈夫的主要情感交流工具是电话,大部分留守妇女与丈夫联系的频率集中在1周左右,大部分留守妇女与丈夫每次的通话时间在10分钟左右。但也有7.0%的留守妇女与丈夫每隔1个月以上才联系一次;两成以上的留守妇女与丈夫每次的通话时间不足3分钟,或不通电话。电话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夫妻分离的距离感,然而,这样的沟通和互动频率远远不能满足留守妇女和丈夫的情感需求。留守妇女在与丈夫通话时,谈论较多的是关于孩子的情况、相互的关怀与叮嘱以及家庭生产情况。

59.0%的留守妇女表示很了解丈夫的心事,17.3%的留守妇女认为自己不了解丈夫的心事。夫妻之间的相互了解程度是对应的,即在丈夫很了解妻子心事的夫妻中,妻子很了解丈夫的比例最高。54.3%的留守妇女表示会把自己的烦恼与心事主动告诉丈夫,由于顾忌到丈夫在外务工的心情和安全,留守妇女一般会有选择地向丈夫倾诉自己的苦恼与心事。另外,68.6%的留守妇女会主动询问丈夫的苦恼与心事,31.4%的留守妇女不会主动询问。

丈夫外出务工对夫妻关系的正面影响多于负面影响。大部分留守妇女认为她们的夫妻关系在丈夫务工后没有变化,而在夫妻关系有变化的样本中,夫妻关系变得更好的居多。在可能影响夫妻关系的因素中,留守妇女首选的三个影响因素分别是第三者插足、丈夫不管家、丈夫跟自己的思想观念不一致。在丈夫外出务工期间,8.3%的留守妇女和丈夫出现过感情危机,虽然这一比例并不高,但反映出两地分居对夫妻关系造成的潜在影响和威胁。留守妇女对丈夫的信任程度较高,相对于收入、出轨等方面,她们最担心的是丈夫的安全和身体健康。养家糊口是留守妇女对丈夫最大的期望,除此之外,注意安全、多关心家人、戒掉不良习惯等也是部分留守妇女对丈夫的期望。



(四) 留守妇女的家庭关系与社会网络

大部分留守妇女认为丈夫长期外出务工并没有导致子女普遍“更不听话”的现象。留守妇女在子女抚育方面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没有能力辅导子女学习、管不住子女、没有人帮忙照顾子女及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子女。丈夫外出务工对子女的学习辅导和监督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留守妇女管教子女的方式主要是讲道理、训斥和体罚。“打骂”对儿童来说是一种身体虐待和语言虐待，会使儿童遭受很大的心理伤害，对儿童健康的人格塑造极为不利。

劳动负担和精神负担都很沉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留守妇女与子女的沟通。留守妇女担心子女成长中的问题主要有学习问题、身体健康与安全问题、道德与人际交往问题。留守妇女家庭对子女的期望是“多读书”，而不是“早挣钱”。虽然留守妇女普遍重视子女的学习问题，但她们与学校老师的联系频率并不高。

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之间的关系大部分融洽或一般，有时会有矛盾。他们之间在经济方面，既相互独立但又保持着密切的来往。未分家和与公公婆婆同住的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高于分家和不与公公婆婆同住的留守妇女，前者在劳动上获得的帮扶多于后者，前者心理上的不良情绪也少于后者。公公婆婆的帮扶对于减轻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和减缓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总体上看，丈夫外出务工对于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以及其他婆家人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影响较小，但留守妇女大多认为丈夫外出务工后，其与公公婆婆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丈夫外出务工期间，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以及婆家人产生矛盾时，主要是通过自己来处理（双方协商解决或者自然化解），对社会网络的使用较少；在遇到与社区成员的纠纷时，血缘和姻缘网络对于维护留守妇女的权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村干部在血缘和姻缘网络薄弱的留守妇女解决与他人的纠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遇到困难时，血缘和姻缘网络是留守妇女寻求支持和帮助的首选，地缘网络居其次，其他正式网络往往是留守妇女求助的最后选择，村干部并没有在留守妇女遇到困难时起到作用；在情感交流方面，地缘和业缘网络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血缘和姻缘网络次之。

(五) 留守妇女的心理感受

留守妇女感受到的生活压力大于非留守妇女，其中 36~45 岁的留守